

試論陳翰笙有關中國農村貧窮化論點的形成

李宇平

一、前言

二次大戰以前，關於中國農業落後與農民貧窮，學者之間的解釋有兩個主要的理論類型。其一稱之為分配理論 (distribution theory)，其二稱之為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折衷理論以為，農民之貧窮不但由於其所得之大部分被稅收、地租等吸取，且因生產者本身首先就已經不振，而生產者之所以不振，乃由於農場組織之不健全，運輸困難，政府政策不夠健全、生產因素投入量不足等因素造成。分配理論則強調，農民所得的大部分，透過租金、高利貸、稅收與不公平之交易價格已被榨取殆盡，而僅有的剩餘已無法改善或擴大其農場，並改善其生活水平。地主、商人、放高利貸者及官員構成具有財富和權力的社會階級。他們以法律保護自己，並以種種方式去剝削農民。當此階級之財富愈為增加，土地累積愈多，更可據以榨取農民更多的財產。土地分配因此愈為不均，農業剩餘的大部分乃流向大地主。農民可用以再投資以提高收穫量和生產的資源愈為貧乏，農業技術與農作方法凍結在傳統的水準上，農民因此愈為貧窮。(註一)

分配論者論證問題的方法，所根據的基本假設，以及推論的邏輯過程均是以馬列主義思想為基礎。此不只是因為分配論者闡明社會變遷的動力法則，全部指向於對階級支配與剝削的各種分析，同時也是因為經濟被他們認為是社會特性和社會運動的決定者，透過社會所由發生之生產基礎動力的檢視，闡述構成歷史進程之重要基礎的各個發展規律，

以及其與社會各時期發展狀況的相關性。分配論者以此一經濟決定論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因而是一種對產生作用的力量以及發展法則的研究，同時也是對反覆出現之社會結構的特徵和模式的探索。人類社會行爲的發展既與特定的社會結構互爲呼應，說明人類行動創造出的各種力量，在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可以獨立於人類的意志而發揮作用，並在事實上控制了人類，這正說明分配論者在某種程度上近乎歷史決定論主義，（註二）分配論者主張從可以表現整體的具體現象（如經濟力量）著手，以掌握歷史發展之本質，也同時說明分配論者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而非從當時實在的具體事件著手，爲中國農村之愈趨貧窮化提供解釋性的理論。

陳翰笙（一八九七—）德國柏林大學史學博士，自二十年代起就在世界學術界享有盛譽。他不像別的歷史學家以斷代史或國別史巨著成功。他是一位注重革命實踐的史學家，傾注畢生精力於社會形態轉化的研究工作。（註三）其在史學上的卓越成就，爲其對有關中國農村落後與農民貧窮提供分配論的觀察角度，並爲中國農村發展之研究，樹立典型的探究途徑。馬若孟推崇其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自成一言之言，具有經典性的地位。（註四）本文擬就陳氏思想傳承、理論基礎、現狀認知以及結論推演，說明陳氏中國農村貧窮化論點的論證過程及其特色。

一、陳氏演化式史觀的淵源

民初以來在思想界佔支配地位的「科學主義」(Scientism)不獨強調科學實在的方法能用來解釋人類的思想及其行爲，並且相信人類社會可以根據預定的規則來分析。由此社會結構在特定歷史階段有其必然的發展類型，人與人之間互相關係的變化和矛盾亦將導致社會按階段循序前進。此種純粹的、直線的進步觀，以達爾文主義有關有機物進化規律的假說爲基礎，闡述生命現象僅是簡單的物質，並按照確定的科學規律運動的論點，實則把社會領域的觀察引向唯物主義。正是根據不變的物質力量可以發現支配社會發展之規律，以及社會發展之規律與科學運動規律一致的觀點，把從現代科學遺產中產生的最有生氣的馬克斯社會理論推向了流行的高潮。（註五）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著有如下的一段名言：「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

型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註六）一如其他中國的馬克斯主義信徒，陳翰笙立即肯定了該段關於社會發展的陳述中似乎包含的唯科學論的暗示。他在回憶錄「四個時代的我」曾有如下的一段告白：

「通過學習『資本論』，使我懂得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自我規律，了解一些馬克斯主義的基本理論。馬克斯花費四十年時間寫成的『資本論』，對解釋社會發展史確有獨到之處。」（註七）

經濟型態的交替被描述為自然歷史的一個過程，說明馬克斯對有關係成歷史進程之重要基礎的各個發展規律的發現，即有關經濟社會的運動規律的揭示，已將社會發展具現為一可以獨立於人類意志控制之外的客觀歷史過程。發現社會過程之客觀規律，正是陳翰笙認為馬克斯貢獻的偉大之處。

但是陳翰笙對馬克斯社會科學觀的認同，不僅在於該種理論表現為一種分析社會的工具，更在其所作出的嚴格的歷史決定論闡述。『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該段名言，不只說明經濟是社會特性和社會運動規律的決定者，同時顯示經濟決定論成為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整個人類進步之規則的同義語。陳翰笙一方面認為「一切生產關係的總和，造成社會的基礎結構」，一方面強調，農村社會勞動力的喪失，使土地本身存在著喪失其生產財富的特性的危險。（註八）在一篇名為「廣東農村生產與生產力」，陳氏又強調，徹底了解不同經濟區域生產關係的演進過程，對於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序，不難窺其梗概，並且據此推出中國農村危機的淵藪，在於生產力急劇低減。（註九）吾人於此不難推斷，陳氏認為現階段「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社會，純粹的封建已過去，純粹的資本主義尚未形成，正在轉變時期的社會，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前資本主義社會。」（註一〇）其所稱中國為前資本主義社會說，正係以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和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的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所造成的衝突，為對中國社會發展現階段定性分析的依據，而這種衝突的結果，既由總的歷史大方向決定，於是演成不可更改的經濟關係系列。唯此一社會發展之規律過程，雖以經濟因素為基礎，卻以革命活動展現其變化的表徵。陳翰笙說：「要探索革命的正確前途，有一先決問題要解決：『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麼階段？』（註一一）其對革命時代之緊迫性的關切，正說明其對中國社會「現階段」的本質的認知與其對社會發展之基本理論的認識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把整個社會都看作是屬於人類歷史之某一階段類型的現象，成為像陳翰笙這般社會科學家實踐社會改革的依據，所有革命活動之成敗皆以此為標準。如果前一階段封建因素

依然存在，就是因爲一場革命未把社會轉爲資本主義社會。以唯物論爲中心的歷史決定論說明了革命之必然性。這就是何以陳氏認爲中國現階段歷史任務是土地革命之原因。

馬列的經濟決定論法則之所以能在本質上或特徵上激起革命的想像，不只是因爲馬列理論以一種「已被證明」的模式描繪中國社會，使中國歷史符合於社會史的辯證發展規律，使之融於廣闊的世界且具有普遍之意義。同時也是因爲列寧將其轉爲行動（俄國十月革命）並取得成功的雙重吸引力，給許多思想家提供了思考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指南。（註一二）列寧認爲，民族和殖民地理論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要區別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並指出共產國際的任務就是要支持被壓迫民族結成一戰線反對壓迫民族。由於遵循列寧關於殖民地和附屬國革命鬥爭的思想，共產國際會就中國革命的性質、方向、階級內容和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加以規定。（註二三）鑑於中國經濟爲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半殖民地的封建經濟，於是指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即反帝反封建革命。（註二四）陳翰笙自一九二四年起即經由李大釗與蘇聯加拉罕大使介紹爲共產國際工作，並爲共產國際在柏林的機關刊物『國際通訊』撰稿。或稱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瞭解及看法甚至直接由其撰文得知。（註二五）如謂共產國際、俄共之革命輸出，就中國共產黨的起源與發展而言，只扮演經營組織基礎、提供傳播機會的角色，（註二六）陳翰笙與共產國際、俄共在制定適合半殖民地中國條件之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鬥爭策略與戰略上，顯然具有共通之經濟或思想認知方基礎，雙方因得以在運用馬列主義與結合群眾運動方面互爲依助。是以對於抵制或批判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策略之理論與決議者，陳翰笙皆明示反對之意。（註二七）學者稱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國共分裂，馬列主義在中國發展受挫，使列寧的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更加可信。（註二八）對陳翰笙言，亦不例外。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能達到理論與實踐統一的證明，馬列對被壓迫國家革命過程具體條件的經濟分析，就是未來發展策略的依據。反帝國主義趨向的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付諸實踐的結果，因此是不可妥協的道路。

但是確認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國主義及其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實則已預見中國民族革命和反帝之努力將不可避免帶來農民和工人對封建壓迫的抗爭。換言之，民族衝突和階級衝突兩項任務的配合與相互關係密不可分。因

此幫中國共產黨制定適合中國條件之決議的共產國際會認為：「中國民族解決運動的民主趨向能否取得勝利，取決於四億中國農民群眾能夠在程度上同中國工人一道並在他們的領導下參加決定性的革命鬥爭」，（註一九）可見，不只是工人運動，當時的農民問題也已逐漸成爲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而工農聯盟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已逐漸成爲中國革命的重要武器。此其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中國革命的階段性主要內容，是城市工人運動的高漲和農村的土地革命。（註二〇）陳翰笙於一九二七年與李大釗共同組織發動上海工人罷工，並於一九二九年調查上海日資紗廠之包身工，就其身受帝國主義資本家和包工頭的雙重剝削展開深入研究。研究報告且印成小冊，廣爲宣傳，以喚起工人意識之覺醒。（註二一）與此同時，一九二九年陳翰笙經剛從蘇聯回國的蔡和森之指引，進行對海陸豐農民運動之形成根源與發展的了解，因而引發其對農村社會真實面貌之研究興趣，並就此展開廣泛的農村社會調查。（註二二）凡此均足證明，陳翰笙擁護共產國際有關以農民、工人爲決定革命發展策略和檢驗革命發展階段之主要的和決定性之階級力量，並且相信，此種在經濟鬥爭中所結成的階級組合，及其與占有者、剝削者之間所產生的緊張關係，是階級社會對抗形式發生之行動根源。革命行動的發展是對立的階級利益決一勝負之舞台，社會之發展型態亦是由階級關係決定。

但是相信革命行動中政治領域的成敗，是對立的經濟階級利益決一勝負的舞台，是經濟關係決定了集體生活的政治、經濟以及所有的各個方面，換句話說，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發展的矛盾，可以導致不可更改的經濟關係序列，此種觀點，同時在於說明，階級鬥爭做爲歷史動力所具有的普遍性。對革命之激進主義的認同，因而在確認歷史發展之歸趨，具世界普遍性的意義。陳翰笙此一單一直線發展史觀，表現在其有關反對亞細亞停滯說的爭論中。一九二七年陳翰笙在莫斯科任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研究員，曾與時任農民運動研究所東方部部长且爲亞細亞生產方式論之代表人物的馬札爾(Ludvig Madjar)，就中國社會性質反覆論辯多次。馬札爾認爲，中國社會自原始社會解體後，既無奴隸社會，又無封建社會，而只是一種亞細亞生產方式決定的水利社會，至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經濟勢力入侵，中國開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陳翰笙辯稱中國農業雖已商品經濟化，但只有商業資本，沒有工業資本，不能稱爲資本主義社會。（註二三）對於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瓦爾加(Evgenii S. Varga)提出中國前資本主義沒有封建社會，中國社會只有官僚和勞動者之分的看法，陳翰笙亦斥之爲謬論。（註二四）依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詮釋，中國

定居農業的歷史慣例必須在灌溉工程上大規模地合作，早期大規模水利工程的建立，導致專職的職業官僚、專制君主的發展和早期封建社會的消亡，官僚國家因能維持其統治。但是每個王朝用強力取得政權後，都會通過重新分配土地和徵稅壟斷社會剩餘產品，有計劃地消滅上層階級。然而私人財富集中，不可避免的產生新的精英，通過商業利益的增殖和土地租金，他們為控制剩餘產品同國家競爭。結果落在普通人身上的負擔導致農民叛亂、王朝更替和一個新的財產再分配——復原的，儘管沒有改變的東方專制主義。按照這種機制，社會經濟制度不斷產生自身，而不是直線發展為一個成熟的西方類型的資本主義。（註二五）陳翰笙一如其他知識分子，深為這種否定中國具發展前景的深層分析所傷害，他反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反對把它用於遙遠的、前封建的過去？（註二六）正是此種東方社會的概念，肢解了馬克斯主義的兩個關鍵原則：一、對於歐洲模式所顯示的經濟發展道路，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了另一條道路；二、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的範例（只有官僚和勞動者，沒有階級），威脅了階級鬥爭作為歷史動力的普遍性。陳氏的單一直線發展史觀，固然是以階級史觀為基礎，但同時也是反對東方發展不同論的說法的。

儘管陳翰笙關於人類歷史的概念和決定人類歷史之規律的概念嚴守命定論的闡述，陳翰笙相信社會上的一切活動和變遷仍為人力所創造，這種人類本身具有的動力可以在人類的需要和那賴以滿足需要的方法中認識出來。陳翰笙由是強調人類自覺行為的作用，並且認識到富有意義的人類行為領域，其歷史與自然截然不同，而主張對人類社會行為的科學研究，應在窮究社會結構之外，并及社會意識的探究。他說：

「社會學是研究社會結構之正體，反體，和合體；社會意志之動作，反動，和創立；以及現實的社會意志，如何受動的社會結構決定，和此社會結構在其演進上如何接受社會意志的影響而產生新的社會意志。」（註二七）

社會演進就在於人類以自覺統一的社會活動控制大自然，並在其中進行合理之生產和分配的過程。但生產過程本身既具現著社會意識的特徵，其重要意義因此在於從一套社會關係的架構中觀察社會現象和歷史事件。吾人據此可以理解，陳氏何以認為是生產關係而非生產力為歷史變革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這並不是說明歷史發展之規律是由人的意志所決定，或者否定人類發展係由獨立於人的意識而起作用的規律所支配，而是說明人與自然界都參與的一個過程的結果。此其所以陳翰笙相信客觀的歷史動力之存在，並在主張歷史發展之決定性力量是社會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又強調人的

革命意志，有助社會整體之改造。換言之，人類的集體意識和意圖會對歷史進程中的結構變化產生影響，但人類歷史的結構變動，終將受制於社會關係之總合所包含的內在變化趨勢，並且由總的、唯一的歷史方向所決定。（註二八）

根據上述，人類歷史係依循客觀的、命定的發展規律前進，這種新的直線史觀，不獨展現知識分子對一種科學方法帶來之關於自然秩序各方面的堅定信仰，同時說明中國的社會科學家為滿足這種新信仰，實際上正在重組歷史以期適應此一新的社會直線發展史觀。新的直線史觀由是帶來了方法論的革命，一種以自己的前提來論證自己的方法的新的社會研究法於焉產生。儘管二十世紀初期蘭克史學獨霸歐洲學術論壇，（註二九）陳翰笙留德期間或曾受其薰陶，故布史學研究上，強調「在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對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綜合」，（註三〇）強調「具體了解事物，具體表述見解，具體描寫事物」，（註三一）以及要求農村社會之研究工作，「深入現場，實地調查，親身接觸合乎第一手史料，挖掘隱藏著的未暴露現象」。凡此或均可見陳氏對蘭克堅持歷史現象的探究需以對文獻史料嚴格的批判性分析作起點，並認為史學的目的不在搜集事實，而在透過對史實真偽的考證與歷史事件個別真相的重建，掌握歷史的整體性與複雜性等觀念的信持。（註三二）但是陳翰笙以為史學工作者的最根本信條，不在觀念信仰，而在於從實際出發，其首要任務是順應當前社會的改革需要。研究過去因此是為了解釋今天的意義。（註三三）吾人於此不難理解陳氏對歷史的反思，何以竟是一種對科學社會觀的贊同。歷史因此不僅被視為一種試圖解釋世界，而且也是試圖變革世界的批判性社會科學。陳翰笙說：「『資本論』對解釋社會發展史卻有獨到之處，我過去在歐美學的歷史卻沒有使我了解歷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實的堆砌，讀了『資本論』，使我了解真正的歷史。」（註三四）正是這種自認自己置身於一種有助於變革的具體的物質環境和政治環境之中，以及將歷史視為人類獲得解放之過程的理念，歷史唯物論的科學社會觀超越了蘭克的客觀實證史學，並驅使陳翰笙完全以一種經濟史觀的單一模式，解釋人類歷史的形成與發展，且根據一種已被證明的模式來描繪中國傳統的社會。這正是陳翰笙演進式史觀的根源。（註三五）以下討論在唯物史觀經濟決定論的觀念支配下，陳翰笙如何根據「中國為一前資本主義社會」此一說法，論證其中國農村貧窮化之論點。

三、土地關係決定論與大地主興起說

歷史的形成是以人所身處的社會環境為條件，社會力量攸關歷史發展之動向，說明歷史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必須從人類社會化的過程此一現實的前提出發，而社會法則則為尋找歷史動力之原則提供可能探究的途徑。正由於社會學分析造成社會變遷及創造人類歷史之普遍驅力與法則，堪為整體取向之歷史研究的基礎，陳翰笙認為歷史學與社會學在研究取向上皆以社會整體為範疇，兩者同屬社會科學，歷史學可以取法社會學在方法論上之長於以概化原則描述社會發展之特質，有謂：

「社會科學中有二種重要科學，非專究社會生活之某一方面……，而以至周密之方法觀察整個社會生活之全部者。此即史學與社會學也。史學可以追求且敘述某一時代某一地方社會生活之全部。社會學則應付普遍問題。

……社會學探討人類進化之原則，以為研究史學之方法，故可作為社會科學中最概括、最抽象之科學……，史學當以社會學之哲理為指南而後可得正確之方法。」（註三六）

社會法則之為歷史法則，明示歷史研究的方向應當是探索長期的或反覆出現之歷史發展的特徵和模式，但也同時說明陳氏對於有關人類歷史之概念和決定人類歷史規律之概念的陳述，係為史學的社會化進行辯護。

史學社會化不只在於窮究人類社會活動之過程、變遷與發展之法則，同時在於設法對某種社會結構改變的大致趨勢和產生社會推進作用的力量做一般性的詮釋。陳翰笙說：「一切生產關係的總和，造成社會的基礎結構，這是真正社會學研究的出發點」。他又以為早期中國農村概況的調查，過於偏重農業技術的本身，未曾注意到農村的生產關係，仍不能給予一般研究的人們以全面的觀察。（註三七）其強調生產關係是瞭解社會全面發展之基礎的論調，實則是本於如下的假設推演而來，即：生產活動的方式形成陶鑄社會關係的根本，且制約著人類社會基本的結構變遷。這正顯示，陳翰笙之為史學社會化的論調大張旗鼓，實則在張揚經濟社會中生產活動終必彰顯的社會性。

生產是一種社會活動，也正是說，一個社會是以一套確定的生產關係為基礎的。人類要透過生產來維持自我的生存，必然會有個社會發展的過程。陳翰笙以為：「農村諸問題的中心是在那裡呢？它們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和利用，

以及其他的農業生產的手段上；從這些問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農村生產關係，因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意識。」（註三八）生產的社會關係形成社會，說明每一生產體系中必然存在著一套與生產有關的個人之間的明確的社會關係，為人們生活中行動之原動力之所自。農村諸問題既是中國社會問題之重心，土地關係的調節機制因成中國社會系統之支柱。

以土地生產為中心的社會關係會形成社會，不只是說明，個人總是在成爲一個確定的社會形式之一員的情況下才從事生產的，也同時說明土地關係是生產體系中形成了特殊化的分工現象的結果，此一現象使得剩餘生產得以產生，並由一個少數人的集團所獨占，這些少數人便與生產大眾處於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之中。陳翰笙有如下的看法：

「是什麼情況造成農業生產的下降或妨礙它的發展呢？……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只能通過對農業生產中各種社會關係的考察才能加以說明。這些由自然條件造成的關係，不僅決定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環境，而且決定了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質和發展。它們包括生產者一方與另一方之間的關係。這另一方控制著土地、貸款、物質供應（例如肥料和種子）、勞動力價格、市場、以及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項政策——國民政府對於一個邊遠省分人民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什麼影響。」（註三九）

土地的生產關係建立在生存工具所有的基礎之上，一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而是由他在土地關係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陳翰笙因謂：「正如機器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在支配工業生產的各種關係占首要地位那樣，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也在支配農業生產的關係中占最重要地位。」（註四〇）充分流露他對土地關係決定論的信念。

正是各人藉著以土地生產為手段而產生的私人財產之擁有的關係，可以決定社會發展之特質，此一經濟現象不能獨立於人的媒介之外而自有生命的論點，陳翰笙強調了勞動者本身，這種有意識的，可以通過人類歷史的過程為生產力提供連續性的生產單位，在推進社會生產上的關鍵性功能。但也正基於個人藉著以生產為手段可以產生的個人財產之擁有的關係，那些積聚著生產手段，從而也積聚著以土地擁有形式而表現其所得的人，強行剝奪大多數生產者所生產的成果，因而把社會分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陳翰笙從而認為兩造之間所形成的階級利益是相對抗的。衝突取代了共同合作的目的，這個社會所有的制度、法律、道德風尚，因而全取決於各階級彼此對立之形勢：

「在農村社會裡，……經濟作物隨之增長，農村社會的階級分化日益加劇。基本的表現形式是產生了一個能夠將諸如族田之類公共世襲財產變成私人財產的新的剝削階級，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毫無地位甚至最後都無權過問那些行使權力者的所作所為的佃農階級。一旦一個農民成了一個自治社團的成員並參與了對他的財產有影響的那些決定，那麼他就僅僅成了機器上的一個嵌齒，在機器運轉的過程中他是沒有發言權的，而且他又明白這部機器的性能。……那些不屬於受到優待的農戶的較富有的農民，往往對某一「受排擠」的經歷或不公道的行為表示憤怒，但是他們都無能為力，因為那些控制族的人也控制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法律上的補救手段。」

（註四一）

正由於階級衝突是不可更改的客觀力量的模式，且社會的階級結構是不可更改的人類秩序之一部分，階級結構乃形成土地生產關係與社會其他層面，如政治、經濟的主要聯繫。

階級關係是政治、經濟權力分配所圍繞的主軸，也是政治經濟組織所賴以維繫的樞紐。正是這種階級關係支配一切社會體制，以及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軍閥官僚，暴斂財富，躍升而成新興地主。但是階級關係之強化，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密不可分，同時也是由於在土地關係機制制約之下，貨幣權與土地權合而為一之故。因為土地既是地主個人財富的主要存在形態，同時也是他們財富增殖的主要源泉。貯藏價值與投機價值的雙重功能，使土地不僅對商人、高利貸者有極大的誘力，對各地的軍閥也有巨大的吸引力。加之中國傳統經濟土地商品化的特點，社會財富的貨幣形態最終多沈積於此。中國經濟土地權與貨幣權合而為一的財富型態，乃成階級支配之主要工具，階級剝削之主要對象。陳翰笙說：

「因為中國經濟的情形不允許迅速的工業化，軍閥暴斂來的財富，大部分是放在土地上，拿地租當作利息。于

是大軍閥擁有大土地，東北數省大者數千頃。小軍閥有小土地，也是數千畝數百畝。現在廣東的南部、雲南的迤南、江蘇的江北、綏遠、四川的全省，都是這樣的情形。」（註四二）

又說：

「由於封建主義關係之殘餘，新軍的指揮官們只不過是一伙軍閥，他們往往同時是地主和買辦。袁世凱是中國

第一個最著名的代表。在他之後，像繁星不計其數的大小軍閥遍布各省。從這些軍閥中浮現出一種新式地主，這是由於他們通過稅收，從貸款中抽取佣金以及剋扣士兵的薪餉養肥了自己。這種新地主比那些屬於舊鄉紳的大地主勢力要大得多，因為他們現在可以直接憑藉武力收取他們的地租，……。這種購置地產的活動無論何時何地都在進行中，……土地價值以及隨之而來的地租普遍趨於上漲。于是就掀起了一個土地集中的新浪潮。……農民破產的數量在不斷增長。」（註四三）

地主階級占有社會主要生產資料及土地的最豐饒部分，從而決定了他們在經濟、政治生活中的顯赫地位。依仗地主階級財力支撐的各地軍閥正是以此一點要挾中央政府，迫使它保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使地主階級的地位更形鞏固。再者，由於土地權與貨幣權合而為一，地主階級不僅在農業中，而且在工業、商業中也有強大力量。它的勢力通過商人、高利貸者、軍閥，後來甚至結合上帝國主義者，伸入經濟、政治各個領域。這也正說明中國社會中土地所有制根深蒂固。大地主不斷推陳出新，勢力愈演愈盛。但也正因此種階級構成與階級對立的本質，並未隨著社會繼起形式的出現而產生相當幅度的變化，以人身的奴役關係和統治關係為基礎的地產權力，這種封建主義的關係依然鞏固。經濟關係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一如往昔，經濟上的支配或從屬，皆融入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裡，封建地主的支配性便透過私人的契約關連及稅收的直接付給來表現，地主與農民功能上的仰賴關係依舊深厚。因此即使瞬間社會經濟變動，消滅了部分的地主，由於社會變動的形式全然局限在既定的組織中，這種以人身的統治、剝削關係為基礎的地產權力，仍能造就新的地主。陳翰笙說道：

「中國的地主與外國的不同，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們是收租者，商人、盤剝重利者、行政官吏。許多的地主兼高利貸者，可以變成地主兼商人，許多的地主兼商人，又可變為地主、商人兼政客，同時許多商人、政客，也可變為地主。地主大半有槽坊、油廠及穀倉。另一方面，貨棧及什貨店主人，就是土地受押人，終究要變為土地的主人，這是著名的事實。」（註四四）

封建關係既然鞏固，剝削關係可能發展的極限就有可以擴大的趨勢。土地壟斷日益加深，新興地主不斷竄出，農民日趨窮困。陳翰笙說「大地主是農村崩解的因素」，（註四五）其中道理，或即在此。

四、帝國主義剝削論與中國的非資本主義化

對陳翰笙而言，帝國主義對中國此一落後國家的經濟衝擊，緣自其以犧牲中國經濟而利於帝國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之形式，對中國之地方經濟資源作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此種不平等接觸，說明中國此一低度發展經濟體系與世界經濟的銜接方式，會使資源由邊陲流向中心，且會產生各種阻礙機能，使中國之經濟體系無法有效分配資源以造成經濟成長。陳翰笙以為，「自從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危機在中國露出了它的猙獰面目以來，外國的軍事侵略和財政侵略的過程加快了一倍。今後中國的工業資本註定要縮減和衰落，中國的農業不能指望有較好的命運。」（註四六）這正說明，低度發展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等不同生產體系間的不平等交易，其本質固然是以剝削關係為基礎，但此種剝削關係也同時顯示了，落後國家的經濟會被帝國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與擴張所決定。

中國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間之關係，之所以會由帝國主義經濟體系的發展與擴張所決定，在危機表現的基本形態上表露無遺。中國近代經濟危機具有生產不足危機與生產過剩危機相結合的特性。此一特性的產生，依陳翰笙所言，即生產不足的危機是由農業經濟中仍然存在封建的經濟型態所決定的。而生產過剩的危機，則是由中國近代經濟已被捲入世界經濟體系，帝國主義剩餘農產品在中國傾銷所形成的。所謂封建農業經濟所存在的生產不足危機，係由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之間的矛盾關係造成（下文另有論及）。而資本主義經濟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則在於高度的社會生產力與有限的購買力不能配合，從而表現出生產過剩的危機，中國之所以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形態，實質上是帝國主義國家經濟危機對中國的轉嫁，因而具有濃厚的半殖民性質。陳翰笙說：

「就連中國的富農，如今也在縮減他們的耕地面積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他們擔不起那種幾乎肯定會由變幻莫測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引起的種種風險。他們也經不住日益增加的進口農產品的衝擊。……凡是研究過中國情況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幾乎都在那裡發現了大量的封建殘餘，但是只有極少數學者沒有忽視中國的政治經濟中那種複雜的殖民地性質，這種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於加強目前封建關係的韌性，甚

至強度。——中國農民不但正在受封建主義之害，而且也在受資本主義之害，不但正在受中國生產不足之害，也在受國外生產過剩危機之害。此外，他們還像殖民地人民那樣正在外國的統治下受苦。」（註四七）

但是中國內含於世界經濟體系之中而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特殊的壓榨對象，同時意味著，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生產範圍底擴大，大部分殖民地生產範圍勢將漸次縮小。此其所以不同體系間資源的流通，雖為帝國主義形成的中心要素，但中國與先進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附屬關係，只是助長帝國主義投資之惡性效果，並不能使資源流動的形式由傳統農業部門大量流向現代產業部門，以致無法誘導資源以造成產業成長。陳翰笙說：

「凡是研究過中國當代史的人全都清楚的知道，外國的商業用它的火車帶來了工業資本的深遠影響。工廠製造的商品日益增長的進口，使全國的手工業趨於衰落。金屬製造工，不論是鐵、銅、錫還是銀的製造工，陶工和瓦工，油漆工和家具製造工，裁縫和製革工人，製繩工和木刻工，特別是繅絲工和棉紡工，全都因現代工業品（其中大都是外國貨）的衝擊而感到前途渺茫。」（註四八）

外國投資之惡性效果，不獨就產業面而言為然，就資金面而言亦然。帝國主義國家的投資將會使真正的資源由落後國家流向帝國主義國家，這樣的推定，同時顯示，外國資本實際上是取代而非補充國內的儲蓄。依陳翰笙的發現，南京國民政府新擬定設立的許昌煙葉買賣機關，原準備籌集資本五百至一千萬元，由於大多數華商煙葉收購商和華商捲煙廠資本很少，不可能提供這樣一個新的數額的資金，因此，「外國托辣斯，特別是『英美煙』，就必然成為這個方案的主要受益者。」（註四九）結果，地方經濟漸漸被帝國主義者控制在經濟體系中現代的、動態的部分，而經濟體系中落後的部分仍留給地方資本。外國資本所獲得的利潤如果再投資於地方，雖然同時增加了外國資本控制下之國內工業之利潤，但這似乎只是延緩了資本最終外流的期限而已。

但是，帝國主義國家將資源由中國匯回國內，其對中國地方經濟的控制，亦即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此一半殖民社會之間利益輸送的銜接方式，不只是帝國主義控制下歷史過程的產物，同時受到中國本有生產關係運作方式的影響。誠如陳翰笙說明英美煙草公司如何促進煙草種植所稱：

「中國買辦、官僚和地方士紳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滲透的良好媒介，通過這個媒介，這種滲透縱使相

當緩慢，但卻無疑在或多或少地向前推進。只有通過這一媒介，外國貨幣資本才能達到中國腹地，在那裡設立工廠，並且受到政治和軍事上的保護。」（註五〇）

基於鞏固剝削基礎，陳翰笙同時認為，絕大多數本身就是地主和買辦的中國軍閥與官僚，他們永遠不會幫助農民擺脫他們所受的奴役，他們只想盡可能地繼續保持土地壟斷狀態，因此就外國資本家看來，這些軍閥和官僚，「他們幾乎是不可少的，因為他們能起到維護治安並使中國有貿易安全的作用」因此，這種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比其他任何因素更加有助於加強封建關係的韌性甚至強度。（註五一）換言之，帝國主義對中國之剝削，固然會帶來附從於該帝國主義的主要經濟構造，但此一構造實則就是原有生產方式之自身。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所建立之剝削統治，就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而言，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孤立於其他生產方式之外而存在。是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決定了帝國主義的剝削關係所具有的某種獨特之經濟體系的特徵。

中外經貿關係的結合方式是中國本有生產關係的反映，同時說明了陳翰笙所認為的商業資本或高利貸資本在中國此一低度發展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擴張，顯然係透過在中國此一邊陲國家建立一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網絡，然後再通過它們與中國此一經濟體系銜接起來。陳翰笙說：

「早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在長江的若干口岸向外商開放以後，中國的貿易和高利貸資本就不再把它的活動範圍局限於國內市場，而是跟外國的工商業活動掛鉤了，於是像中國商船公司之類強大的買辦機構便應運而生。

」（註五二）

又說：

「生產美種煙草的費用，也比種植穀物或豆類的費用高。……它意味著沒有中國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幫助，像『英美煙』這種形式的外國工業資本便不能夠深入到中國內地。……英美煙雇用的中國買辦對於這一點最清楚，他們是首創貸款給煙農的人；因而也是最先利用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來推進工業資本的人。」（註五三）

買辦階級的產生，在陳翰笙看來，顯然不只是對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其所佔優勢的保證，同時也確保了中國的財貨將以利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流向資本主義國家。

五、勞動價值觀的形成與國內勞動力遞減說

對於一些熱衷於用科學及其引發的價值觀念和假設來詰難傳統價值主體的知識分子而言，歷史唯物論之能做為政治策略的基礎，不只在其提供了分析社會和歷史的實際方法，更在其呈現了透視人類生活的新的哲學體系。唯物論說明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從屬於自然的秩序，並能通過科學方法來控制和認知，預攝了在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時，必須自一項經驗性的試察著手，就人類存在之必要條件的社會生活之具體過程做一番檢視。（註五四）陳翰笙認為現時中國的農村研究，在以科學社會學的研究途徑著手，使現實的社會實質進抵於科學的認知，故對社會研究途徑有些反省：

「在今日，科學的社會學已陷於危險的境地。它不是偏傾於社會現象之一種無意義的分類，便只自封於哲學觀念的一個抽象領域。這兩種情形都不能使我們了解具體的社會實質。社會學的主要工作，在使現時的社會實質進抵於科學的認知，而解釋其進展的路向，不忘其一切歷史的和經濟的意義；分析人類的相互關係，而明了某種社會條件之下的集團意識。」（註五五）

社會存在決定人類行為的認知，以及相信歷史性的解釋必須根源於通過經濟觀察到的、正在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同時說明，對陳翰笙而言，歷史須從現實的前題出發，它的中心任務，必在解釋生存條件的發展以及經濟動機在人類生活中的廣泛影響力。陳翰笙說：「有以經濟為各種行為之動機，有以經濟為特殊環境之成因；至經濟的事實，莫不認為組織社會學的基礎。構成今日中國社會之經濟的事實，大都屬於資本主義制度發達以前之種種關係。」（註五六）社會活動可以化約為經濟條件來解釋，正是認識到一套社會制度和觀念對立於另一套社會制度和觀念，其唯一的起因是它由以構成的經濟環境。

但是經濟結構體系制約著整個社會型態的變遷，社會的基礎條件有與經濟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發展過程，同時說明，歷史須立足於物質世界的堅實基礎上，探求人類生活與自然世界間交互作用的關係。正是基於人類與其物質環境之間的創造性作用，必須通過人對他存在之環境的塑造始能加以認知，陳翰笙強調勞動價值的重要性。他

以爲人類逐漸的將外在的自然世界宰制於所欲達成的目的之下，係通過勞動逐漸轉化而成，因而強調土地生產力之高低與勞動力增減之直接關連。有謂：

「勞動力之喪失，對於我們在此考察的這個地區而言，並不像在幾代以前可能會有的那樣具有一種人口過剩的性質，它並不是一種由於人口增長過快而造成的人口過剩。它使產量下降，使土地貧瘠，其爲害之烈，絕不亞於地力被耗盡和祖先會爲之付出一番心血的種種改良措施的衰敗。因爲土地和勞動力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勞動力的分配情況發生了變化，支配農業生產的各種社會關係中的種種新的因素已經改變了經濟基礎。……勞動力既沒有得到有效使用，也沒有被當作商品出口；它簡直是被浪費掉了。」（註五七）

勞動效用的降低非繫於人口過剩、人地關係比例失調，所演變而成之土地單位面積產量下降及單位面積人力投資之過剩，亦不見於土地過度使用、地力耗竭所導致之單位勞動人口生產力之低減，勞動力之增減消長表現在勞動力和刻劃經濟結構特徵的分配關係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發生之脫節現象。勞動生產能力之擴張在既存的生產體系中受到限制，正說明，陳翰笙以爲人類社會經濟的演進是可以辨識的生產體制，可區別的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爲標誌的，勞動力的一般水準則可反映業已存在的或即將發生的特定生產方式。據此可以推知，陳翰笙了解中的勞動力，顯然有別於一般指涉的生產力，僅指明人本身單純作爲勞動力的存在，並不包括勞動過程得以發生而必須結合進去的生產因素、生產資源。換言之，陳翰笙較爲在意勞動力作爲人與人對外在世界持續鬥爭所表現的力量。

陳翰笙之所以強調勞動是人用以進行持續之物質生產的力量，並主張經濟現象不能獨立於人的媒介之外而自有生命，實則是因其發現農民的生產活動有與其所控制之物質生產手段愈形分離的趨勢；分離於自己製造出的成品，分離於他們用以進行生產的工具。生產活動的結果與生產的原初目的（擁有生產資源與生產利潤）相矛盾，生產活動降格爲一種對外在社會條件的適應，而非對外在世界的支配。此其結果，無地農民不斷增加，直接造成農民無產階級化。農民喪失生產工具的過程，陳翰笙有如下的描述：

「如此高昂的地租，加上所有隨之而來的各種負擔，壓在農民身上，並把他們驅逐到高利貸者那裡。……許多農民借貸穀物度荒；有些農民只能典他們的衣服、家俱、甚至鋤頭、草耙、耙子、犁等等。穀物貸款的利息通

常半年爲百分之三十；當舖的月利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有時高到哪百分之六。沒有人能夠想像……有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有這麼高的利率。破產的農民通過抵押過程迅速失掉他們的土地；由於不被工業接收或吸收的無地農民不斷增加，工資總的說來正在下降，各種形式的租金則在上升。這樣一來，破產現象便一再重演，並且加速這一過程，直到農民無產階級化。」（註五八）

農民喪失生產工具或資源之所以意味著勞動力之流失，正是因爲對生產工具或資源的佔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生產者個人才能的發揮。且在生產過程中發生決定作用的是勞動力，而非生產資源。生產資源只有生產的可能性，必須加諸勞動力，才能產生實在的生產力。正是人與物的結合提供了較好的形式，從而可把潛在的、可能的生產力變爲現實的生產力，陳翰笙發現勞動力才是人自己之自我生產之資源。陳翰笙以爲華南地區百姓離鄉背井者日益增多，「這些農民在他們祖輩土地上勞而無功，這對於他們來說已不僅是暫時出國勞動的一種理由。這種情況所具有的規模，已經使得土地本身存在著喪失其生產財富的特性的危險，因爲土地的生產能力再也保不住了。」（註五九）說明，當土地的生產力發生嚴重阻礙的時候，不先解決勞動力的問題，即生產要素如何結合之方式的問題，勞動力即將失其推進生產活動的動力作用。勞動力有其作爲社會發展的先驅作用，正是陳翰笙正視農民日趨喪失其對生產資源或工具之控制能力與其勞動力遞減間之直接關連的原因。

但是陳翰笙強調，透過生產活動中人本身對生產因素的結合，才能改變人及人的外在世界，實則也是說明，這個結合本身將受到具體的、客觀的現實條件之制約的。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生產力諸要素才能有適當之結合。陳翰笙以爲農民無以爲生，淪爲難民流離失所者日多，正是由於缺乏一套得以有效使用勞力的土地制度的配合，故謂：「近年來流亡東北的難民人數雖增加得很快，耕地面積卻增加得很慢……現在中國黑龍江流域還有百萬畝以上可墾的荒地，可是成千成萬的難民不能使熟地有與人力相當的擴張，東北土地問題的嚴重，也可窺見了。」（註六〇）又以爲華工出國日多是「由於地租過高，貧農和中農得不到足夠的土地以使用他們全部有效的勞動力，並充分利用他們哪怕是已經過時的工具。」（註六一）陳氏認識到人地比率失調爲中國農業危機之根源，但問題之癥結，他以爲，不在勞動力之過剩，而在「高度集中的所有權與土地的廣泛分散使用同時並存，其結果幾乎所有的小土地都小得成爲一種浪費。」（註

六二）換言之，是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的不協調，私人所有與公共需要的不協調；耕種者沒有足夠的土地以維持生計，大部分的土地為不事耕作的人所有，從而造成勞動力大量流失，勞動力相對遞減之現象。

對於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與使用權的分散日益對立的方向發展，從而造成農村地主所有制日益發達，租佃關係日益擴大，及勞力銳減的現象，陳翰笙有剴切的說明。陳氏認為近代中國的土地，雖然愈來愈向地主富農手中集中，但地主富農之經營並未發展。因為「農場的經營過於細小，佃農或僱農也不能僱長工。在這種情形之下，地權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縮小。經營面積也很少能擴大。所以勞力的應用益難。」（註六三）至於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卻有相當的比例是分成若干小塊租給貧苦農民耕種的。這種小農所使用的土地面積最多約不過五畝，經營規模卻小到極為可憫的程度。且每段耕地的平均面積，一般趨向，也是減少。耕地的分散，土地分配的不均，由陳翰笙廣泛的農村社會調查，可以得知。如其發現河北定縣有百分之七十的農家占有耕地不到全數的百分之三十，其餘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農家占有耕地，幾當全數五分之一。又經其調查杭州平湖，「很多大地主，該處土地多為地主所獨占，地主以百分之三的人口而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註六四）；河南南陽縣有百分之六五人口都是貧農，他們所有的耕地，僅當全耕地五分之一，中產之家，常有土地五十至七十畝；上等之定，平均享有農田百畝。」（註六五）

正如陳翰笙強調透過生產活動中人本身對生產因素之結合，生產資源才有生產的可能性，才能產生實在的生產力，近代中國封建土地關係占絕對壓倒優勢，其中儘管又分自耕與租佃兩種類型，陳翰笙以為從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具體結合過程看，二者的共同特點都是小規模、低水平的個體經營。此其原因在於：「小農田天然排斥大量生產的發展，大量勞力的使用，資本的集中，多數牲畜的飼養與科學的應用。」農田分散的趨勢，雖與農田面積無關，卻是農業生產的障礙，並且使合理化的管理及土壤改良，均無從實現，這個趨勢使土地日益瘠瘠與枯竭。（註六六）以此，分離的小塊土地耕作及弱小的個體農民經濟力量，正從需要與可能兩個方面限制了生產工具的改良，致「地價雖然日益低廉（按指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期間），但荒地面積日益增加，無地農民日漸增多。」（註六七）

但是荒地增加，農民破產，以致勞動力流失，其原因不純粹在於土地利用與土地分配發生失調，地租形成的變化與地租剝削的繁重等因素，影響亦大。地租占有是地主階級土地所有的物化表徵。近代中國社會，農民生產占社會產

品總量的絕大部分，而農產品的一半甚至更多又作為地租落入地主之手。地租剝削沉重，農民不堪負荷，棄地而逃者多。流民增加，工資下降，地租愈形上漲。如此惡性循環，必致農民無產化，而遠走他鄉。故在這種土地壟斷、租佃關係益盛的情況下，陳氏以為「動搖著整個經濟的是租金而非資本」，並謂此種「在中國佔優勢的非資本主義關係，在極小的農場單位上得到進一步的反映和表現」（註六八）儘管地租累積是形成近代中國社會財富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最終來源，陳氏認為地租並非資本形成之基礎，因而也不能視為資本。他說：「工業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中國決沒有與工資利息紅利並立的那種地租」，現在中國的所謂田租，不單是田租，還包含著一部份農業的紅利，甚至一部分工資」（註六九）或許地主直接剝削正是農民剩餘價值的一個超額部分，陳翰笙斷定此時租金不具資本主義地租之形式，並非資本。此亦可見以租金為中介，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之間的矛盾關係對農民勞動之影響。此種農村經濟破產之說法，與現今一般學者的因果解釋截然不同。一般以為是人口壓力使社會生活水準下降到維生經濟的最低界限，造成國內移民傳統的變動及華工出國、幫會興盛、與次生社會成員的大量出現。在社會物質資源支撐達於極限時，人口與資源比例失調必然演成人和人之間之矛盾。（註七〇）陳翰笙則認為人與人之間關係之不協調，導致勞動力之流動及華工之出國。此或可見其重視人本身作為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與外在世界持續鬥爭時所表現的力量，這正是他強調勞動價值與勞動力消長間之互動關係，在農村經濟破產上具相當角色的原因。

六、結 論

根據前文的討論，民國初年以馬克斯主義為基本的論述，可能從數個方面對歷史研究的思想產生了影響。其一，它反映並引導歷史學研究方向的轉變，從早期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轉向對社會和經濟的複雜而長期的過程的研究。其次，馬克斯主義使歷史學家認識到需要研究人們生活的物質條件，並把農業經濟當做整體而不是孤立的現象，並且在這個背景下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再者，馬克斯主義的重要性在於它喚起對歷史研究的理論前提以及整個歷史學研究理論的興趣。

以馬克斯的理論為依據的史學著作大多直接與當前政治形勢的需要有關，並且由一種哲學設想和政治價值觀做先導。正如陳翰笙有關中國農村的的研究，其目的在為中共中央土地革命的政治訴求尋找現實之依據。但一般馬列主義者皆未將嚴格的經濟發展理論與對歷史事件的分析聯繫在一起。由於缺乏一種共同的方法論的立場，馬列主義歷史學與一般學術性歷史研究有其隔絕之處。陳翰笙儘管未曾處理個別歷史事件對社會結構之衝擊，但陳氏強調史學社會化，主張結合理論社會學有關社會結構與社會意志互動關係的觀念研究，以及經濟社會學有關田野調查的實地考察途徑，則使馬列泛政治化趨向的著作，原先非憑藉著不能加以經驗證實的廣泛概括，不能成就一家之言的空泛作風，有了紮實的經驗研究以及方法論的依據。

馬列主義認為，在物質關係諸因素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因素，且為社會生產得以進行、社會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註七一）就此而言，陳翰笙儘管認為中國有了一定的資本主義因素，但從社會經濟型態的總體特徵而言，近代中國仍屬於前資本主義時代，是「土地所有制」居於支配地位的時代。陳氏顯然不認為中國的土地問題，可以單純地理解為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所直接發生的問題，更重要的毋寧是以土地所有與使用型態為基礎而構成的社會關係、政治關係下所發生的剝削與支配的關係。換言之，剖析土地關係之調節機能是研究近代中國社會體系與結構的關鍵。正因為土地關係之調節機制對社會系統的制約，封建殖民土地關係狀況對於社會各方面乃會產生決定性之影響，土地關係因而會通過工具、資金和產業結構（土地為財富之表徵）等媒介因素之作用，影響社會生活，並通過階級和政治結構的媒介作用，影響政治生活（地主可以通過商人、高利貸、帝國主義，伸入政治各領域）。這似乎是陳翰笙據以推演其有關農村貧窮化論點之理論基礎。這也同時說明，陳氏認為，對長期間之經濟發展與所得分配之變動趨勢，具有絕對影響力者，乃是經濟社會內結構之變化，而非人口增減、商業變遷等客觀經濟情勢之變動。就某種意義而言，社會結構且足以決定商業、人口對於經濟成長、所得分配之作用方式與程度。正是本於這項認知，儘管陳氏認識到三十年代初期國際經濟不景氣對中國經濟之衝擊，（註七二）他仍然強調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始終存在著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激烈矛盾，影響人地比例之分配，從而造成之農村經濟破產，此一長期以來即存在著的社會內部因素，使中國經濟陷於恐慌。階級結構以及附帶而生之超經濟的人身支配與統治的關係，因此具有某

著種自主與控制之力量。

根據上述，陳翰笙似乎著意從一個關於歷史現實結構的嚴格概念出發，將生產方式視做社會結構的核心。相對於其強調結構中的體系失序和變化，將人類社會現象中的關係看得比現象本身的性質尤為重要。費孝通此一被歸類為折衷理論健將的社會學家，則從社會的功能上尋求社會現象認知的途徑，認為社會上每一事物的存在，根本就是一種功能，都有某種任務要完成，而且正在發生作用。費氏因而側重金融調劑與土地問題之關係，強調城鄉金融關係密切為不在地地主制出現之前提。據此，費氏批評陳氏不應把租佃制當作歷史遺存來研究，而應視租佃制為耕種者與投資者之間利益的調節者，為不在地地主制整體之一部分。或正基於此種把整個社會視為一互相依靠之整體以及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之過程互相連結的認識，費孝通同時發現，由於城市地主難於收到租金，地主與佃農同樣是三十年代經濟變動局勢下的犧牲者。換言之，三十年代經濟恐慌的證據不在分配不均，所得差距之擴大，所造成之農村經濟恐慌，而在中國經濟所得全面低減，城鄉交困，全面經濟皆陷於蕭條之境地。雙方立論之差距，意識型態的紛歧自為重要因素。這同時說明，何以陳翰笙為德拉貢尼(C.T. Dragon)的詮釋者，(註七三)並走向土地革命的道路，而費孝通則何以根據湯尼(R.H. Tawney)的論點，強調技術改進能使中國經濟具有發展前景。(註七四)

註釋

註一：Ramon 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apter 2.

註二：Karl Popper著，李豐楙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一年)，頁三六。

註三：陳洪進，「陳翰笙的史學思想」，見陳翰笙著，任雪芳整理，「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一九〇。

註四：Ramon Myers, *op.cit.*, P.15.

試論陳翰笙有關中國農村貧窮化論點的形成

陳翰笙著，任雪芳整理，『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三四。

註五：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90-10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apter 1. and 8.

註六：這段文字原為馬克斯於一八五九年一月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提出的。見「馬克斯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卷一三，頁九。其後於一八七三年，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有關的同一內容的地方，全文又予轉載。見同書卷二三，頁九四。此段原委，見「世界上古史綱」編寫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會其為問題的問題」，『歷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二號，頁四。

註七：陳翰笙著，任雪芳整理，『四個時代的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三四。

註八：陳翰笙，「中國農村研究」，汪熙、楊小佛主編，『陳翰笙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四三～七二。

註九：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陳翰笙文集』，頁七三～九八。

註一〇：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頁四八。

註一一：前引書，頁五三。

註一二：D.Y.Y. Kwok. *op.cit.*, p.148. E.O.科瓦廖夫，「共產國際在思想理論上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輯十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五年），頁一三～一五。

註一三：科瓦廖夫，前引文，頁一一～一七。

註一四：同上註。另參見 Arif Dirlik, *Revolution &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63-69. 文見 Richard C. Horton, *The Communis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28-1931*, 見林海譯，「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戰後的一場爭論」，『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輯一。

註一五：『四個時代的我』，頁三五。

註一六：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62-265.

註一七：『四個時代的我』，頁三九～四十。

註一八：D.W.Y. Kwok 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一三九。

- 註一九：科瓦列夫，前引文，頁一八。
- 註二〇：科瓦列夫，前引文，頁一八～二一；Arif Dirlik, *Revolution &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7~1937*, pp.79-85.
- 註二一：『四個時代的我』，頁四五。
- 註二二：前揭書，頁三六。
- 註二三：前揭書，頁四十。
- 註二四：前揭書，頁三九。有關亞細亞停滯論的爭論，另參見 Joshua A. Fogel, "The Debates ov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Soviet Russia, China and Jap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1, (1988, Feb.)
- 註二五：William Rowe, "Approach to Modern Chinese & History of Society," in Oliver Zunz ed. *Reliving the Pa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p.234-136.
- 註二六：陳翰笙，『西雙版納的土地制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序言。
- 註二七：陳翰笙，「中國的農村研究」，『文集』，頁四三。
- 註二八：陳氏歷史唯意識的主張，可見李大釗對其思想的影響，見B.A.克里夫夫與B.A.克拉斯諾娃著，鄭厚安、劉佐漢譯，「李大釗的思想演變過程」，見『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輯八，頁一〇八～九。又見 Maurice Meisner, (Ma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46-149.
- 註二九：李國祁，前引文，頁三三～三四。
- 註三〇：『四個時代的我』，頁二～十。
- 註三一：『四個時代的我』，頁二〇五。
- 註三二：George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 cit. chapter 3. . . 李國祁，「十九、二十世紀德國史學的發展」，『新知雜誌』，第三年，第一期（民國六十二年二月），頁三三～三四。
- 註三三：『四個時代的我』，頁二〇四。

試論陳翰笙有關中國農村貧窮化論點的形成

註三四：「四個時代的我」，頁三四。

註三五：演化式的歷史思想意指在說明歷史的整體性時，因為把歷史的整體化約為一個同質體，其中有它單一的性質及決定性的因素，這思想方式與演化過程中標示出一個推動發展的因素最相孚。見胡昌智，「由鑑戒式的歷史思想到演化式的歷史思想」，『中國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民國七五年），頁一六五。本文所指之演化式史觀是指明二個特徵，一、歷史依客觀規律循序漸進，二、社會就其整體而言，可以化約為一個支配性的因素——即經濟決定論。

註三六：『陳翰笙文集』，頁三一。

註三七：同上書，頁四三、四四。

註三八：同上。

註三九：『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三。

註四〇：同上註。

註四一：同上書，頁四三。

註四二：『陳翰笙文集』，頁一三〇。

註四三：『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八。

註四四：同上書，頁六一、二。

註四五：同上書，頁五六。

註四六：『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十。

註四七：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引言，頁十、十一。

註四八：前引書，頁六。

註四九：陳翰笙，『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陳翰笙文集』，頁二二。

註五〇：Ibid. pp.47-8.

註五一：同註七一。

- 註五二：「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引言，頁七。
- 註五三：陳翰笙，「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陳翰笙文集』，頁一一〇。
- 註五四：D.W.Y. Kwok, op. cit.
- 註五五：陳翰笙著，『陳翰笙文集』，頁四三。
- 註五六：『陳翰笙文集』，頁三一。
- 註五七：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一二二。
- 註五八：前揭書，頁三、四。
- 註五九：前揭書，頁二。
- 註六〇：陳翰笙，「難民的東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集刊，第三號，（民國十九年），頁三六、七。
- 註六一：『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四、五。
- 註六二：同上書，頁二一。
- 註六三：陳翰笙，「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文集』，頁一三三。
- 註六四：陳翰笙，「現代中國的土地問題」，『文集』，頁四七。
- 註六五：同上，頁四九。
- 註六六：同上，頁五五。
- 註六七：同上，頁七二。
- 註六八：『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三、四。
- 註六九：陳翰笙，「黑龍江流域的農民與地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集刊，第三號，（民國十九年），七。
- 註七〇：何清漣，「中國近代農村經濟破產和人口壓力的關係」，『中國農史』，一九八七年，第四號。『馬克斯恩格斯全集』，卷四六，上冊，頁四四。
- 註七一：陳翰笙，『解放前的地主與農民——華南農村危機研究』，頁七章。

註七二：陳翰笙，「中國現代的土地問題」，見『文集』頁四三；又見『四個時代的我』，頁一九五。

註七三：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189-91.